

“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说质疑

范书义

1894年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孙中山早期思想轨迹、孙李关系和晚清政局的重要问题，史学界至今仍然见仁见智。海峡两岸某些学者提出的“劝李革命说”（以下简称“劝说”），就是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笔者对此实难苟同，兹特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们。

一

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倾向改良的表现，还是他“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主要活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孙中山当时的实际思想状况。“劝说”以《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为主要依据，断言孙中山早在1885年即已立志革命，1892年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因此上书李鸿章应是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主要活动”。

《建国方略·有志竟成》，是孙中山在1919年写成的，属于事后追述，并非当时实录，因而有待于科学鉴别工作。

通观新编《孙中山全集》，不难发现，孙中山在追述自己立志革命缘起时，就有三种迥然不同的说法，即“中法战败之年”、大学毕业之后和甲午战争时期，甚至在同一年份的回忆中也存在明显的矛盾。例如，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时而说：直到悬壶澳门，“还不能说我对政治有过什么特殊的兴趣”^①；时而又说：“鄙人苦心经营革命事业，盖已二十余年于兹矣。”^②1923年，孙中山一会儿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③；一会儿又说：“余自倡言革命，建造

① 《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8页。

② 《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0页。

③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民国,垂三十年”^①。要辨别这些追述的真伪,唯一可靠的依据是孙中山早期言行。

在1885年中法战后到1894年中日战前这段期间,孙中山的主要经历是习医悬壶和“求知当道”。1886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翌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历经五载,于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先后悬壶于澳门和羊城。孙中山习医悬壶,以医术“救人苦难”,实乃“科学救国”之举。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至少两次向清朝统治阶级当权派或有权势的人物上书请愿,恳求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威实行某种社会改革。1890年《致郑藻如书》和1894年《上李鸿章书》,就是目前见诸载籍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倾向。

郑藻如,广东香山县人,曾被李鸿章荐举为津海关道,综理洋务海防,博得“才大心细,洞悉机要”的赞誉;继而出任驻美、西、秘三国公使,竭力反对美国排华暴行,不辱使命;1886年因病返国,终老故里,既“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著成效”,又为“谊同宗,生同里”的郑观应“悉心订正”《盛世危言》,郑观应“颇折衷相许”。作为同乡晚辈的孙中山,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洋务大员、“一邑物望所归”的权势人物,油然而生敬仰和期望之情,是不难理解的。他在《致郑藻如书》中透露,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因鉴于“国家风气大开”而确信“此材当不沦落”,所以早就抱有“求知当道”的念头:“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然而,由于“见闻半资典籍”,“决策未尝施诸实事”,惟“恐躬之不逮”,所以决计循序渐进,首先“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再效法以济世之才自负的西汉贾山著《至言》、唐之杜牧著《罪言》,写成改革方案,“质之交(当)世”,依靠清朝政权,推行于全国^②。

第二次上书,孙中山并没有按照原订计划求诸总署,而是选定了李鸿章。这除了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③外,还由于李鸿章既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是孙中山同乡友好郑藻如、郑观应的顶头上司。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表示:“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他推崇李鸿章有“育才爱士之心”,揆度“国家时势当务之急”,确信像自己这样既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乱治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又涉猎“西学”,掌握了“专门之学”的人才,“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因而才斗胆“求知于左右”,深

① 《在欢宴各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6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③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望李鸿章“有以玉成其志”^①。由此可以看出,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上李鸿章书》同《致郑藻如书》是完全一致的,即上书清朝统治阶级当权派或有权势的人物,企图依靠他们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孙中山的两篇上书,不仅指导思想一致,而且基本主张也一脉相承。《致郑藻如书》建议发展农桑、禁绝鸦片、普及教育,断言“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②《上李鸿章书》进而提出一个改革纲领:“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个“四大之纲”,继承并发展了《致郑藻如书》,而其实质则是主张“步武泰西,参行西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以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农工商业,从而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驾欧洲而上之”^③。值得注意的是,从《致郑藻如书》到《上李鸿章书》,都没有涉及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而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依靠旧有统治阶级实行不触动其主要基础的社会改革,只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孙中山习医悬壶和求知当道,共同的思想基础即“改良祖国,拯救同群”^④。这是孙中山在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以后,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难而引发出来的一种进步思想。起初,他着眼于救人,决定学医,“以医亦救人苦难术”。然而,经过不断观察和思考,他逐渐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必须“尽铲恶政治而去之”^⑤。孙中山倡导的政治改革的内涵,有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开始,他“但知政治之当改革,尚未尽知政体改革之根本大计,则所谓改革者,仍属易代之常轨”^⑥。因此,他主张“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⑦上书郑藻如、李鸿章,就是孙中山试图实现这种理想的重大步骤。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⑧,于是决志使用暴力,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兴中会的成立和乙未广州起义,标志着孙中山开始摒弃改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6、18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5页。

④⑤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⑥ 《在沪尚贤堂茶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页。

⑦⑧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2页。

良幻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孙中山的这种转变,早在1896年12月就被香港《支那邮报》所道及:“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①

当然,这决不是说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没有任何革命因素,诸如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与陈少白等结为“四大寇”等等,无疑都是青年孙中山因“不嫌于满清之行事”^②而引发的叛逆意识的流露。正是这种叛逆意识,成了孙中山能够从改良转向革命不可或缺的内因之一。然而,叛逆意识既不等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又没有成为决定孙中山行动的思想主流。习医悬壶和求知当道的实践证明,在孙中山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为生民请命”^③的改良思想。

有的论者把孙中山的“求知当道”、“为民请命”,进行和平改革,称之为革命进程的一种形式,断言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之前,就羡慕洪秀全、谈论反清革命、试制炸弹,而他上书李鸿章的根本目的,则是希望打入清朝统治上层,取得机会来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这里的问题在于,既然孙中山的政治抱负是效法洪秀全,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那么他又为什么热衷于打入清朝统治上层,难道说他若真的在清朝政坛上取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就能够实现他的推翻清朝统治的夙愿?当然,精明如孙中山决不会抱有这类幼稚的幻想。其实,孙中山倘若打入清朝统治上层,充其量也只能推动清廷实施他所倡导的“四大之纲”。推行“四大之纲”,尽管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进步之举,但并不属于革命的范畴。孙中山的这类活动,只能称作改良,而不可能成为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二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和王韬、特别是郑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问题在于连结孙、郑的思想纽带究竟是什么?“劝说”断言“孙中山求见李鸿章志在‘一白胸中之素蕴’,请他参加造反。”郑观应正是为了帮助孙中山实现这种“素蕴”,才以尺函介绍孙中山去见盛宣怀,请其“进而教之”的。揆诸史实,这种论断是难以成立的。

截至目前为止,见诸载籍能够反映孙、郑主张翕然契合的文字,只有《农功》、《上李鸿章书》和《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农功》是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成的。经郑观应酌加修改,辑入《盛世危言》。《农功》是一篇专门论述农事的文章,主张“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建议清政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并遣员赴西方国家“讲求树艺农桑、养

①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页。

③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

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溯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以便推行全国。《农功》把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与发展农业生产，看作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①。

《上李鸿章书》是由孙中山拟就、经郑观应润色而成的，虽然没有附录于郑氏个人文集，但却有着明显的郑氏思想痕迹。只要把它与《盛世危言》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它所着意阐述的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四大之纲”，不论是行文还是立论，无一不与《盛世危言》有师承关系。1892年《盛世危言·自序》说：西方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②显然，《上李鸿章书》中的所谓“四大之纲”，是从这里征引和推衍而来的，区别只在于没有涉及议院问题，并增加了“物能尽其用”一条。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是郑观应为请托盛宣怀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而写的。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这里所谓“其志”、“其说”，主要是指孙中山“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③。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也对自己的这种抱负和见解，进行了必要的申述。当然，“其志”、“其说”并非始于1894年，早在1891年前后，郑观应就在《农功》中加过这样一段话：“今吾邑孙率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罌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④

上述三篇见诸载籍的文字表明，连结孙中山和郑观应的思想纽带，决不是什么反清革命，而是企图依靠清朝当权派学习西方，自上而下地实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劝说”依据《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得出了郑观应接受了孙中山劝说李鸿章“参加造反”的主张。事实果真是这样么？否！

郑观应自称“涉足孔孟之庭，究心欧美西学”^⑤，因而形成了“主以中学，辅以西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

③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戈止羲：《对〈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之补正》，《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页。

⑤ 《盛世危言后编》卷4，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学”^①的融合中西的思想体系。几千年名教学说的浸渍,使“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的观念,在他的灵魂深处扎下根蒂。几十年欧风美雨的洗礼,又使他确信中国只有仿行西法才能“强兵富国”。在经济上,他主张“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②,把振兴农工商业的希望寄托于封建政权;在政治上,他要求效法“英、德两国议院之制”^③,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而上述两项的共同前提,则是承认并维护清朝统治。他的卷帙浩繁的论著,诸如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到《盛世危言》,都是以这一思想格局为中心而推衍出来的。他将自己的论著“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乞求“当世巨公”“因时而善用之”,希望清朝经过改革重振康雍盛世之雄风。他特意把《易言》修改本的署名,从杞忧生改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④。善解人意的湘系要员彭玉麟赞扬《盛世危言》“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⑤。

郑观应不仅是著名的改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洋务事业的实践者。他以自己“深谙洋务”、“通权达变”的才智,博得某些王公贵族和封疆大吏的青睐,尤其受知于李鸿章及其洋务总管盛宣怀,被誉为“槃槃大才,中西兼贯”^⑥,倚畀有加。从1892年郑观应重入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起,到1903年离沪赴桂为止,“这十年是郑观应工作顺利,生活安定,情绪高昂,最得意的一段时间。”^⑦1894年与孙中山在沪会面时,郑观应既然正值因清朝权势者的栽培而春风得意、“志在四方”^⑧之时,又怎么会轻易支持孙中山劝说自己倚为靠山的“中堂”“树立反满革命旗帜”呢?“才识兼优”如郑观应,决不会忽视下列的严酷现实:

第一,他自身的政治前程、经济利益同清朝的兴衰息息相关,支持“叛逆”,有害无益,甚至有杀身灭族的危险。

第二,李鸿章作为“中兴名臣”、“三朝元老”,圣眷优隆,权势煊赫;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心腹和洋务总管,“财势两足,心敏手辣”^⑨。清朝栽培了他们,他们对清朝也一往情深,岂肯轻信一介书生之言,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冒险盲动。

第三,当时清朝虽已进入衰世,但尚未出现威胁其统治地位的全国革命形势。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无论于事于理,郑观应都既不会萌发反清革命意识,又不

① 《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② 《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0页。

③ 《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2页。

④ 《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36、235页。

⑤ 《盛世危言·彭玉麟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27页。

⑥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⑦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03页。

⑧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郑观应集》下册,第330页。

⑨ 《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

会支持孙中山劝说李鸿章“参加造反”之举。事后郑观应的实际表现,更加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不久,郑观应就公开表态反对革命,说什么“慨自中日和后,半年来毫无振作,而内江外侮,不谈革命则说瓜分”,由于“时事日亟”,“非效法德、日维新变政不可”^①。他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维护“孔孟三纲五常之道”的“维新变政”,防止瓜分,抵制革命。当历史跨进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跃居时代主流之后,郑观应公然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为清朝统治者筹议“安内之法”,声称只要“毅行宪政”,就能消弭“党祸”,平息“内乱”^②。及至辛亥革命以后,郑观应仍旧对君主立宪制度倦怠不已,说什么“历查中外史册,皆由君主而变君民共主,由君民共主而变民主。我中国民智未开,程度尚浅,欲由君主一跻民主,恐如法国革命流血必多,惟祷祈上帝潜消默化耳。”^③

“劝说”认为经过郑观应介绍,孙中山在上海结识了“素耳其名”的王韬,而王韬既动手“修正”《上李鸿章书》,又托人为孙中山开通晋见李鸿章之路,“是一个有革命意志与革命精神的人”。他之所以协助孙中山,就是因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举,与自己“平日的革命思想相吻合”。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王韬是否“修正”过《上李鸿章书》?“修正”说源于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然而正是这位陈少白,在答复邓慕韩的质询时却说:孙中山“曾出原书”与王韬“商兑”,“当时有无删改则殊未可知耳。”^④

第二,王韬是否托请友人介绍孙中山晋见李鸿章?王韬托请友人介绍说,同样出自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但近年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中发现的信函表明,孙中山是企图通过郑观应、魏恒和盛宙怀等请托盛宣怀介绍晋见李鸿章的。

第三,王韬协助孙中山是否基于相同的革命思想?断定王韬具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的主要依据,是他曾上书太平军。其实,据近人考证,所谓上书太平军纯系子虚乌有之事^⑤。只要通观《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蘅华馆日记》等著作,就会发现王韬是一位忧国忧时的魏默深式的人物,学贯古今,识通中外,“耿耿不忘”“忠君爱国之念”^⑥,极端仇视“犯上作乱”之举,坚持“以笔墨化衰贼”,“表彰忠孝,诛殛奸

① 《盛世危言后编》卷4,《郑观应集》下册,第360、361页。

② 《盛世危言后编》卷3,《郑观应集》下册,第286页。

③ 《盛世危言后编》卷1,《郑观应集》下册,第37—38页。

④ 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6页。

⑤ 杨其民:《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⑥ 《弢园文录外编》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9页。

回”^①，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以期“安内以攘外，富国而强兵”^②。

三

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中发现的三封信函，即《魏恒致盛宣怀函》、《盛宣怀致盛宣怀函》和《郑观应致盛宣怀函》^③可以看出，孙中山始终把实现上书李鸿章的希望寄托在盛宣怀身上。盛宣怀在孙中山这次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劝说”依据两个“旁证”断言“孙中山经盛宣怀介绍见到了李鸿章，谈了内容很不平常的话，盛可能还从中出过主意，是个关键人物。”其实，这种论证问题的方法和由此而推导出来的结论，既不符合认识规律，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首先，不应离开盛宣怀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思想状况，孤立地谈论所谓“旁证”。

盛宣怀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依附李鸿章办理洋务起家。李鸿章先后令其参与创建或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使之成为自己的洋务总管；又相继荐举他署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和“实掌北洋机要”的天津海关道，使之成为自己的“左右臂”^④。前者是盛宣怀在仕途上赖以飞黄腾达的经济基础，后者则成为盛宣怀“挟官以凌商”^⑤、“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一己”^⑥的凭藉。盛宣怀不仅协助李鸿章“调济中外之情，运筹帷幄之地”^⑦，而且以厚利结纳满汉权贵，因而早在甲午战前就蜚声朝野。1896年他奉张之洞札委督办汉阳铁厂，并经张之洞和继任直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联合推荐，被清廷任命为铁路总公司督办，授予太常寺少卿衔和专折奏事之权。年底，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从此他就以上海为基地，遥控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后于1908年正式合并为汉冶萍公司），近制轮、电、纺织三局和新建的通商银行，成为“财势两足”的早期官僚资本家。

基于维护并发展自身“财势”的考虑，盛宣怀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清朝封建统治。早在1895年他就一面推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表示“万分钦佩”，特意索取二十部拟送

① 《弢园文录外编》附录，第384页。

② 《弢园尺牍》续钞，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③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戈止豪：《对〈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之补正》，《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

④ 《王韬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⑤ 《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⑥ 汪康年：《商战论》，1896年12月15日《时报》。

⑦ 沈毓桂：《恭贺盛杏荪观察调任津海关榷篆拙句六章》，《万国公报》复刊第43册，1892年8月17日。

“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①；一面策动李鸿章上书清廷变法自强。1896年盛宣怀在取得专折奏事权之后，即上《条陈自强大计折》，请求效法西方国家，“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切实搞好练兵、理财和育才三大政^②。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盛宣怀攻击维新派“变法太锐，求治太急”^③，认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只要兵政、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厘定章程，实力举办”^④即可。这表明盛宣怀所追求的变法自强，并没有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窠臼，仍然着眼于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仅排除了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革封建专制体制的内容，而且“采取各国之所长”的目的恰在于巩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后来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盛宣怀越来越明显地站在进步潮流的对立面，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能设想这样一个人会欣然赞助一个素昧平生、两手空空的“草野小民”劝说“遥执朝政”的封疆大吏反清呢？

其次，不应离开特定的时代和孙中山的思想实际，孤立地诠释“旁证”。

“劝说”提出的第一个旁证，是孙中山在1900年10月写给李鸿章幕僚刘学询的信。信函内称：“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临时政府，以权理政。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按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按指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按指何启）、容（按指容闳）皆可各当一面也。”^⑤“劝说”认为孙中山提名可在新政府任职的人，除自己和刘学询外，杨、李、何、容都是自己“早期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密谋的参与者，把盛宣怀和这些人并列在革命政府名单里，可知关系非比寻常。很可能当年孙中山把求见李鸿章的来意全部告诉了他，还得到了他的赞助。”仅仅依据孙中山提名盛宣怀为拟议中的新政府成员，就断定盛宣怀赞助过孙中山劝说李鸿章反清之举，实难令人信服。

只要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孙中山提议的新政府成员名单，包括三类人物，即革命派、维新派、地方绅衿和洋务官僚。孙中山、杨衢云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李纪堂是香港富商，于1900年4月由杨衢云主盟加入兴中会。何启是香港立法局议员，

① 《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② 《愚斋存稿》卷1，第3—10页。

③ 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洋务运动》（8），第62页。

④ 《盛宣怀复陆伯葵阁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⑤ 《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

著名的维新派,著有《新政真诠》,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他是兴中会乙未起义和庚子“两广独立”的幕后策划者。容闳曾经参与戊戌维新和庚子自立会活动,1900年4月支持谢纘泰提出的各维新党派“在能干的基督教徒领导下而联合与合作”的主张,并批评孙中山“他太轻率”^①,刘学询“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②,曾经参与兴中会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末进入李鸿章幕府,庚子年间策动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盛宣怀是著名的洋务派和官僚资本家。

孙中山提出这样一个政府组成名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抱负和实力之间呈现反差的必然结果。庚子事变发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意发愤为雄,倒满兴汉,“推翻北京政府”,“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③。然而力不从心,“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④。相形之下,兴中会“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⑤。由于缺乏实力而又企望实现宏伟抱负,所以使孙中山等兴中会领导者认识到必须联合各种力量,共同奋斗。1900年8月孙中山在从日本返国之前发表谈话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根据这种考虑,我个人准备从中尽力,故匆匆决定回国。”^⑥为了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孙中山企图借重容闳,把各种“政治改革派”“联成一体”,并“暗中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三大总督和康有为等保皇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就不得不设法调和、迁就各种政治势力的意向,因而不再执意坚持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公然承诺新建国家的主政,“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决奉刘学询当之并裁定。

孙中山推崇盛宣怀,显然是从属于这一总的策略。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久仰”盛宣怀“德望,欲求一见”^⑦。庚子年间,孙中山鉴于盛宣怀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在洋务

①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省政协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③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6页。

④ 《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0页。

⑤ 《致菅原传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页。

⑥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

⑦ 《魏恒致盛宣怀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

官僚中无与伦比,而且在政治上处于“承上注下”的地位,“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①,因而企图把他从清朝营垒中争取过来,以便借助他来筹集军费和联络东南三大总督。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劝说”提出的另一个旁证,是1912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托陈荫明给亡命日本的盛宣怀传话:“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②“劝说”推断所谓“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无疑也与‘盛宣君足当内政’有相同的历史渊源”。

毋庸置疑,在盛宣怀因倡议“铁路国有”、“借款造路”而弄得声名狼藉、被清廷革去邮传部大臣职务、并成为辛亥革命打击对象的时候,社会舆论对盛宣怀是极端不利的。面对这种氛围,孙中山竟然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其中奥秘值得深思。揆诸史实,似乎可以说孙中山的表态,半是权宜之计,半是真情流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费竭蹶,“度支困极,而军民待哺,日有晷溃之虞”^③。陆军总长黄兴急得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因而提议争取盛宣怀“助力民国”^④,使之以汉冶萍公司等借债筹饷。孙中山“坐视”黄兴之困,“而环观各省,又无一钱供给。以言借债,南北交相破坏,非有私产,无能为役”^⑤。因而,他接受黄兴提议,“召盛而使募债”^⑥。他承认这是一种“权宜之政策”,“譬犹寒天解衣裳付质库,急不能择也。”^⑦孙中山接见陈荫明,谈话的主题是让盛宣怀以汉冶萍公司抵借外债“转借与民国”^⑧。他是在要求盛宣怀为“筹款”时,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的。这清楚表明,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何况孙中山力主以汉冶萍公司抵借外债还另有打算!他在答复反对派诘难时说:“中国矿产甲于五洲,竞争发达,当期其必然。”^⑨“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弊亦大。舆论于此,未必深察。”^⑩孙中山否认“分一矿利与日人”为“大害”,固属谬误,但他关于盛宣怀是个“大资本家”,而“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垄断中国矿产“其为弊亦大”的论断,却是千真万确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对盛宣怀并不是没有丝毫“恶感情”的。

盛宣怀及其亲信则怀着别样的心态,趁机把“筹款”与“复产”联系起来,一面声称为

① 《鄂督张香帅致直督王夔帅电》,《愚斋存稿》第89卷,补遗66,第8页。

② 《陈荫明复王勋电》,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③ 《复张谔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2页。

④ 《黄兴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3页。

⑤⑥ 《复章太炎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6、85页。

⑦ 《复张谔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3页。

⑧ 《陈荫明复王勋电》,《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2页。

⑨ 《复章太炎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6页。

⑩ 《复张谔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2页。

民国筹款一事,“义不容辞”^①;一面“要求将公司产业及盛私产已充公者一律发还”^②。孙中山无奈,只得表示:“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③盛宣怀“若回华,可任保护”^④。盛宣怀闻之,感激涕零,信誓旦旦地说:如蒙早日发还“私产”,必当“竭力筹款报效”^⑤。黄兴得知盛宣怀“承允助力民国”之后,致电表扬:“见义勇为,毋任钦佩”^⑥。然而,过了几天,因“未得确切回答”,黄兴就电责盛氏必“不诚心赞助民国”,警告他切勿观望,“即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⑦这表明在对待盛宣怀的问题上,黄兴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所谓“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既含有某种策略意义,又是孙中山争取盛宣怀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孙中山认为民国一经取代清朝之后,“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⑧,“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路入手”^⑨。而修造铁路的最佳方案,则是“全归国有”^⑩、“借债筑路”。他指出:“前清之借债筑路,实亡国之导线”^⑪。但“其弊病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即不可借”,“若能使借债之条约不碍主权,借债亦复何伤?”^⑫孙中山认为盛宣怀具有经办实业的经验,他所控制的汉冶萍公司实为中国“富国基础”^⑬,他所倡导的“铁路国有”、“借款筑路”又同自己的主张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孙中山有意借助盛宣怀以实现自己的理想。1912年3月盛宣怀写信给孙中山说:“中华之民穷困极矣,非洞开门户、大兴实业,恐仍不能副公挽回时局之苦心。侧闻公阅历欧亚,知足民大计必从实业下手,路矿、鬻法尤其大者,与下走平生怀抱差幸不谋而合。”^⑭孙中山赞赏盛氏见解,立即复信说:“执事伟论适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⑮是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两次会晤盛宣怀,“极言铁路国有政策相合”^⑯。盛宣怀所以与孙、黄等周旋,意在求得南京临时政府对其身家和财产的“保护维持”。但在暗中却攻击孙、黄领导的“同

① 《王勋致陈荫明电》,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1页。

②③④ 《陈荫明复王勋电》,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2页。

⑤ 《盛宣怀致森恪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9页。

⑥⑦ 《黄兴致盛宣怀电》,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33、234、235页。

⑧⑬ 《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340页。

⑨ 《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5页。

⑩ 《在上海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6页。

⑪ 《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1页。

⑫ 《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1页。

⑭ 《盛宣怀致孙中山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327页。

⑮ 《孙中山来函》,1912年3月15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⑯ 《盛宣怀致孙慕韩函》,1913年6月20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盟会太无道德”，胡说什么“军兴以来，俨成盗界”^①，“不足与谋”^②，力图从财政上扼杀南京临时政府。

四

“劝说”断言“革命”是孙中山与李鸿章会谈的主题。根据是：一曰1912年上海自由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革命记》第1册所载《孙文》传记：“值中日战争之前，孙乃由湖南溯扬子江渡海至北京，冒死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二曰吴敬恒在1925年编著的《中山先生年系》中所徵引的《别传》记载：“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至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耄辞”。^③

其实，只要把《孙文》与《别传》所记述的有关孙、李会见的情节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是基本吻合的，区别主要在于详略不同，后者似乎是前者的缩写。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中虽然引述了《别传》的有关记载，但对其真实性却持否定态度，明确表示：“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④

揆诸史实，《孙文》所记，错误百出，纯系“无稽之谈”，不足为据。

第一，长江流向。长江流向自西徂东，由湖南出扬子江本为顺流而下，但《孙文》却赫然写上一个“溯”字。

第二，孙李会见地点。1894年6月孙中山由沪渡海北上。考诸公私记载，是年5、6月间李鸿章除了一度赴旅大和威海等地校阅海军外，常驻天津，从未奉旨或擅自入都^⑤。然而，《孙文》却断定孙中山在北京会见了李鸿章。

第三，李鸿章生于1823年，1894年为七十有二，可是《孙文》却称李鸿章时“年七十有九”。

第四，“革命”二字。冯自由考证说：“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

① 《盛宣怀致孙宝琦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286页。

② 《盛宣怀致孙慕韩函》，1913年8月20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

③ 吴敬恒，《中山年系及行谊》，癸巳年事迹，台湾帕米尔书店1952年版。

④ 吴敬恒，《中山年系及行谊》，甲午年事迹。

⑤ 参阅雷禄庆《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2—472页。

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①既然在1894年孙中山尚未使用“革命”二字,作为洋务官僚的李鸿章在头脑里就更不会有什么“革命”一词的影子了。可是《孙文》却硬说“革命”是孙、李会谈的主题,孙中山密陈“革命之不可缓”,李鸿章则表示“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

第五,李鸿章思想实际。“劝说”断言“当时李鸿章已是年逾古稀、饱经世变的老人,很难设想他会相信一个28岁青年的主意,放弃高官厚禄,参加造反派。但是朝政腐败,难有起色,作为首辅重臣,不免内心矛盾。因此对青年人密谋造反,肯定不会参加,也不会坚决反对,类似上引记述的温言慰勉是完全可能的。”其实,这种推断完全背离了李鸿章的思想实际。

李鸿章对晚清政局,确实深感忧虑和不满,这主要表现在:

(一)李鸿章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内则朝政腐败,“纪纲日堕”,“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②;外则面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潮流,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从而使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他形容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③,犹“如蔽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④。

(二)李鸿章抱着“圣之时”的自信力,积极倡导采用西法,举办洋务,以期大清帝国的“自强”“自立”。然而,这种试图振兴清朝的洋务活动,却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和破坏。当时“人君”“以守法为心传”,“人臣”则“以守法取容悦”,朝野上下,“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他悲愤地呼吁:“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⑤

(三)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对汉族地主势力采取既倚重又裁抑的两面政策,防止“内轻外重”,加强中央集权。李鸿章对此十分反感,愤愤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则颯颯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不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⑥。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因为上述种种忧虑和不满而引发叛逆的思想和行动。1876年8月《字林西报》载文说: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⑦。1882年夏正当中俄关系因伊犁交涉而骤然紧张

① 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

② 《复曾相》,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3—4页。

③ 《复陈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5卷,第34页。

④ 《致何子永中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2页。

⑤ 《复王千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43页。

⑥ 《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6卷,第2页。

⑦ 1876年8月19日《字林西报》。

之际，前常胜军统领戈登来华，曾劝李鸿章以武力夺取政权，被李鸿章断然拒绝^①。李鸿章所以忠于清廷，从无举兵称帝之念，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第一、李鸿章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的头脑里，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②

第二、李鸿章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早年通过科举登上仕途，跻身清朝统治阶级行列，因而当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时，便挺身而出编练淮军，镇压农民起义，并倡导洋务新政，力图使大清帝国“以贫交富，以弱敌强”^③。清廷则依靠李鸿章“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因而频频给予“异数殊恩”：1870年命为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4年诏授相当于首席阁揆、向为满人专利品的文华殿大学士，1894年赏戴前此汉臣从未获得过的三眼花翎。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④

第三、李鸿章生活的时代，虽系封建末世，但尚未出现资产阶级革命形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还处在酝酿阶段，因而企图依靠旧社会戴着皇冠的代表人物实行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的维新思潮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他把早期维新派看作洋务新秀，或设法罗致为幕僚而参与洋务企业和外交活动，如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或“用其言而弃其人”，如王韬。早期维新派则认定李鸿章通达时务、权倾举朝，因而把他引为同调，企图依靠他的支持来实现“变法自强”的理想。这种密切交往直接影响着他们彼此思想的演进过程。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期外敦和好”，并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冑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这种主张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但同维新思潮却有某些相通之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变法多有同情，甚至公然向慈禧表示：“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康有为也肯定了李鸿章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恭维他是“维新之同志”^⑤。能否依据李鸿章对康、梁和戊戌变法的态度，进而推断出他对孙中山“密谋造反”没有“坚决反对”并给予“温言慰勉”呢？“劝说”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其实，康、梁虽然不愧为站在时代前沿的志士，但他们依靠“九重深邃”的光绪皇帝所发动的戊戌变法，只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并非要进行“根本的改造”，而是要求“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政治上

① 雷祿庆：《李鸿章年谱》，第280页。

② 于式枚编，《李文忠公尺牍》，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28册。

③ 《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卷3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8页。

⑤ 参阅拙文《李鸿章与维新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①。经济上企图在保存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求得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康、梁和戊戌变法立足于改善清朝统治,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是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职志。同情前者,决不等于一定会同情后者。把清朝统治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李鸿章,如果真的“温言慰勉”“密谋造反”的人,岂不是自掘坟墓?阶级命运和个人得失,驱使他决不会这样做。

“劝说”还“溯前看后”,以庚子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作为甲午孙、李会谈“革命”的佐证。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事。所谓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议,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和八国联军闯进国门、资本帝国主义推行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形势下,由“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的。他“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而倡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何启的倡议得到兴中会员陈少白、李鸿章幕僚刘学询的赞同和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究竟怎样呢?

孙中山始终为一种怀疑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他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②。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日本友人宫崎等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孙中山未等宫崎归来,就乘船离港南下。7月16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返抵香港海面,等待第二天即将举行的李鸿章与卜力会谈的消息。卜力企图利用李鸿章北上路经香港之机,作最后一次挽留,如果李鸿章答应“两广独立”,就允许孙中山登岸并同他会谈。孙中山一面断言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一面又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③。因此,他既注视着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又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事宜。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1899年李鸿章在担任商务大臣期间,就曾与刘学询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保皇党,孙中山洞悉其奸,没有上当^④。1900年何倡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后,刘学询“自告奋勇”,向粤督李鸿章表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4页。

②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7—78页。

③ 宫崎寅藏著、林启彦改译:《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214页。

④ 《致上海虎城》、《致刘学询》、《复刘学询》、《刘学询复电》、《刘学询来电》,顾廷龙等主编,《李鸿章全集》(3),电稿(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0—871页。

示：“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鸿章颌之”^①。李鸿章意在“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的威胁，稳定两广政局，并非搞什么“两广独立”。因而孙中山一行在6月17日乘船到达香港海面之后，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②。“香港同志报告”，决非空穴来风。在此前后，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大批涌入京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6月18日李鸿章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外宣战，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定《中外互保章程》，李鸿章致电支持，并表示自己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11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卜力回到香港，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③。无论于势于理，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应当说是李鸿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念头的时机。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并没有乘机“造反”的言行。7月12日李鸿章宣称即将遵旨北上。7月17日李鸿章在与卜力会谈时，“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进攻广州，并询问“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设想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英国殖民部据此推断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其实，李鸿章这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乞求英国不要抛弃慈禧，所以他接着就明确表示：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④。当李鸿章拒绝卜力挽留之后，陈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鸿章坐轮，企图请随行的刘学询再次进言。刘氏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⑤。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李鸿章根本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⑥。“劝说‘所谓甲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已动摇了李鸿章对清廷的信念，故李对庚子之再度招降，遂有欢迎总理回粤共同主持独立的表示’云云，显系违反历史真实的推测之辞。

（责任编辑：陈文桂）

〔作者苑书义，1929年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①②⑤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7—78页。

③④⑥ 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8—179、179页。